

典读党史

书人书事

「双百」方针的由来

《毛泽东年谱》里的文艺(之十五)

阎晶明

可以讲,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。这次会议比较集中、明确地讲到了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。“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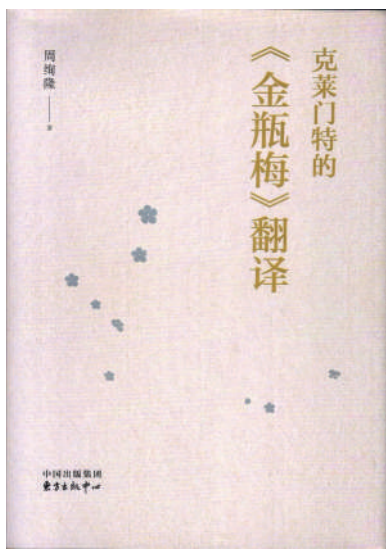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,从总体上认为,确立这个方针“是有必要的”。同时或比喻或正式地讲明了“双百”的含义。从我阅读《年谱》的感受,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“双百”方针,除了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,还基于他一直以来希望和倡导的党员干部要多学习、多掌握知识的观点

无论文史风云如何变幻,时代发展如何翻天覆地,文艺与科学的变革如何日新月异,在当代中国,“双百”方针依然是党领导文艺和科学的方针。为其注入新内涵,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指导性作用,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,也有一些不能忘记的教训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)

说《金莲》:一位双语版责编的翻译研究

李晶



《克莱门特的〈金瓶梅〉翻译》 周绚隆 著

一个多月之前,《克莱门特的(金瓶梅)翻译》摆在我面前,捧着这本装帧雅致的小书,一则新鲜,二则恍然有旧友重逢之感。书诚然是新书,但书里的好些内容,我听作者絮絮叨叨已将近10年了

书稿的基础就是作者十几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“大中华文库”中英对照版《金瓶梅》一书责编时留下的编校记录,在此基础上他查阅许多资料,梳理了《金瓶梅》在英语世界里翻译和出版的历史,写成两篇长文,也就是这本书里的“《金莲》的翻译、出版与修订传播”和“《金莲》的翻译问题考察”

对于《金莲》译文的传神之处,《克莱门特的〈金瓶梅〉翻译》一书中总结了寥寥八条;但对译者所做的删削和犯下的“错误”,则从“译者”“断句”“成语俗语歇后语”的误解到省略、漏译、“人名人称”的误译等多方面,整理出10个章节的内容

对于《金莲》译文的传神之处,《克莱门特的〈金瓶梅〉翻译》一书中总结了寥寥八条;但对译者所做的删削和犯下的“错误”,则从“译者”“断句”“成语俗语歇后语”的误解到省略、漏译、“人名人称”的误译等多方面,整理出10个章节的内容

对于《金莲》译文的传神之处,《克莱门特的〈金瓶梅〉翻译》一书中总结了寥寥八条;但对译者所做的删削和犯下的“错误”,则从“译者”“断句”“成语俗语歇后语”的误解到省略、漏译、“人名人称”的误译等多方面,整理出10个章节的内容

评序专栏

书苑随笔

铭记历史所激发的热情

——读徐鹏的历史小说《太平门》

梁鸿鹰

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,那些智者先贤为民族自由解放付出的智慧与牺牲,人民创造伟大历史的雄浑壮丽,早已成为激励后代的磅礴热情与精神力量,也激励这一代代作家以之为不竭源泉,接力讲好中国故事

徐鹏尊重历史真实,通过小说艺术地揭示了历史进步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性。从1910年川汉铁路筹建到1920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赴法国勤工俭学,10年间整个四川乃至全国革命的种子不断萌芽,川渝人民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,如何走上革命道路,汇成一股革命的伟大力量

小说内容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托,那就是在内忧外患兵戈四起的时代之交,重庆江津18岁青年王培菁为求真理东渡日本,在重庆老乡邹容革命思想启蒙下加入同盟会。邹容牺牲3年后,王培菁受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邀请回国,到重庆体育学堂担任教员,发展革命青年力量

作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,深耕辛亥革命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,触摸和表达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精髓。历史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,冲破艰难险阻,开辟出全新的境界,靠的就是雄健的精神、顽强的意志

朽顽固的封建王朝的历程,这是小说《太平门》一再揭示给我们的。小说里的余英曾言,第一次读到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就认定了中国人要自己的中国,不单单是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,还要创立民国、平均地权

小说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意识和唯物史观,全书从戏班流浪艺人辛佑国起笔,以被革命洪流所带动的普通民众的群体形象,揭示了民众之中蕴藏的力量与智慧。如辛佑国40岁出头才由清帝国首都周边省份一个偏远山村逃难出来,跟着一个戏班,靠着“下九流”里的“不入流”人的帮忙,慢慢生存与成长起来,最后成为华成声的导师、徐春风的灵魂指引



《太平门》徐鹏 著

理论知识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,并不断加以应用,走上报效祖国之路

小说视野开阔、结构宏大,涉笔上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,比如川汉铁路建设、川汉铁路倒账亏空、保路运动、橡胶业及橡胶股票在上海股市的剧烈波动,各地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,1905年绵延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、报业的崛起以及武昌起义、重庆独立、民国政府成立,袁世勋窃取辛亥革命果实、护法战争宣告失败、巴黎和会、五四运动、重庆学生爱国运动、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与工人阶层结合等等,反映了作者历史脉络清晰,知识储备之丰富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,《文艺报》总编辑)

重构中国史前史

——读李琳之《晚夏殷商八百年: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》

王杰瑜

李琳之的新著《晚夏殷商八百年: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》日前由研究出版社出版,他快速给我,嘱我写几句评述。我对夏商周三代没有研究,仅仅是一些常识性的了解,这也是他给我的一次良好学习机会

21世纪之暮揭揭之时,这也是中国国学火热之时。中国老百姓在解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之需后,热衷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。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知识解读,言说和书写,借助着信息化时代的媒介方式,对于社会上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、人生观的形成非常重要,李琳之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

李琳之关注历史始于晋商。因他的哲学专业背景,观中短视的“学院式”研究远远无法满足他的需求,实地走访与考察,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总能使他在晋商的研究中超凡脱俗、观点清新、引人入胜。历史研究终极目标是什么?是求真,是复原,还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引发人们的纵深思考?李琳之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,其目的显而易见。10多年来,他在工作之余,南游江淮,东涉齐鲁,西及陕甘,北达蒙辽,遍迹全国,在中国大地上阅读,在游历中思考,穷源委委,溯中华文明之源,构建“上古中国时代”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在考古学出现之前,对早期中国历史的认识主要依赖传统的历史文献。虽然研究者大都抱着“必于史求真”的态度,无奈上古史事记载都是零星、碎片式的记载,不系统,且研究者因个人修为不同,研究者所构建的上古历史必是每个研究者个体选择的结果。由此才有顾颉刚先生高擎“古史辨”的大旗,提出了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学说。现代考古学为史家“求真”提供了某种可能,但考古材料存在着偶然大于必然的问题,能够把个性的东西或者材料连缀起来,结合历史记载,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,这种工作研究难度大,挑战度极高。即使国家“九五”期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,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然无法解决,足见难度之大。李琳之选择这样的题目展开工作,正是他敢开新局一以贯之的勇气和胆识的体现!

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大。全书前言加正文的11章,注释条目共计1089条,引古代文献达84种,考古文献则应收尽收。将文后的注释加以整理,无疑是一篇很好的“晚夏殷商八百

年”的资料索引

对于上古历史的研究,既需求有扎实的历史文献功底,又必须能够熟练地运用考古材料。当下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论证考辨的学者少之又少。在本书的讨论中,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,驰骋古今、错综隐括,则是该著述的另一个特点。以时间为经,以王为轴,按照历史发展过程自然地形成11个篇章,每个篇章又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,严肃的史事变得轻松欢快,可读性很强。较之秦汉以来的史事,上古更为艰涩,处理起来很不容易。表面上看似写得轻松欢快,但这种轻松是建立在扎实的考证论证基础上的,李琳之在背后下了很大的功夫

当然,任何一部著作出版以后,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,这本书也不例外。如在运用历史文献时,就需要认真注意文献的版本。像《国语》,使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韦昭的注本就很好,再没有必要使用其他版本了;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目前已经有贺次君、施和金的点校本,就无须使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的影印本了。史学著述中,除非必要,一般情况下,一种文献只会使用一种版本,不会同时使用多达4个不同的版本

李琳之的《晚夏殷商八百年: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》这本书,对于想了解和研究上古中国历史的读者而言,是难得的一本好书!

(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)



《晚夏殷商八百年》李琳之 著